

粉碎资产阶级右派  
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  
的政治阴谋

孫定國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2862

14

网络资产管理与  
企业资产管理系统的  
融合应用

——

网络资产管理与  
企业资产管理系统的  
融合应用

网络资产管理与  
企业资产管理系统的  
融合应用

网络资产管理与  
企业资产管理系统的  
融合应用

粉碎資產階級右派  
恢復資產階級社會學的政治陰謀

孫定國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

**粉碎资产阶级右派  
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政治阴谋**

孫定國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0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张 1 1/2 字数 29,000

1958年4月第1版

195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统一书号：2074·86

定 价：(7) 0.15 元

封面设计：任意

00710

## 前 言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是把资产阶级社会学，当作毒草来看待的。中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学，始終坚持着不妥协的斗争。早在几十年前，在上海大学中的一些共产党人和革命知识分子，就曾經和圣約翰大学中的一些资产阶级社会学者，进行过激烈的、尖锐的斗争。这是我們的光輝傳統。而特別重要的是，我們对于一切资产阶级反动思潮，从来也不肯停留在單純的理論批判和学术批判上，而是要通过中国革命的实践斗争，来从根本上駁倒它。党的中央和毛澤东同志，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分析了中国的社会实际和革命实际，制訂出党的綱領、路綫、政策、方針，指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把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引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的偉大胜利。这件事就明白地宣告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同时也宣告了资产阶级社会学在中国的彻底破产。可是，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們，如費孝通、吳景超、李景汉、陈达之流，却完全忘記了历史教訓，又不愿看一看中国社会的偉大现实，竟然在1957年那个不平凡的春天里，大力叫嚣要在国内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他們招搖撞騙，招兵买馬，气势汹汹，真有点象是拿着裙子当作令箭舞一样。而在实际上，他們的这些叫嚣和活动，是假借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为

名，而实行资产阶级复辟的政治阴谋。这在章罗联盟的政治阴谋彻底被揭露之后，真象已经大白于天下了。事实证明，这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原来是一些极端仇视人民民主专政，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仇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术骗子和政治扒手。为了保卫社会主义，为了保卫中国人民的胜利果实，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还为了保卫正确的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在去年斗争紧张的时候，多少理论工作者挥动起战斗的武器，回击了他们的进攻。他们已经是彻底地打输了。他们应该认识到，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并不是那样好较量的。作者的这两篇小文，也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写成的，并曾分别发表于“新建设”和“哲学研究”杂志。它好象是在配合大軍作战的游击队员的手里的一支红缨枪。上海人民出版社要把它合印成小册子，我内心觉得有些惭愧。因为文章写得不好，打击敌人不是那样有力量。但是终于答应下来。我愿以理论队伍中的初手，和广大读者一起，为保卫社会主义的大业，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共同的斗争。

作者 1958年2月6日

## 目 录

必須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学.....	1
必須彻底揭露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恢复 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政治阴谋.....	18

## 必須徹底批判資產階級社會學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企圖在大專學校恢復資產階級社會學，這是蓄謀已久的事情。他們利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口號，大肆活動，幻想使在課程改革中被廢除了的資產階級社會學死灰復燃。1957年1月，章羅聯盟的謀士吳景超在“新建設”雜誌上發表了“社會學在新中國還有地位嗎？”一文，就是他們這種陰謀由竊竊私語轉為猖狂狂吠的信號。從1957年1月9日到2月15日，陳達及其信徒們又以中國人口問題為中心，通過個別訪問和座談，進行恢復資產階級社會學的陰謀活動。在這期間，1月14日“光明日報”發表了“陳達訪問記”。陳達本人在北京市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提出設立社會調查研究（也就是他們所說的社會學）的研究機構提案。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1957年2月20日費孝通在“文匯報”發表了“關於社會學，說幾句話”的文章，應該指出，這篇文章不僅是右派分子恢復資產階級社會學的綱領性的文件，而且還是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的理論基礎。在這篇短文里，費孝通宣稱，他所說的社會學，也就是資產階級的政治學、行政學和管理學。他們要研究的對象是：“……人民代表大會制的運用、民主黨派的互相監督等等，有關人民民主專政的一系列問題。”這個論調，在1957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費孝通又重復了一遍。他堅決地否認馬克思列



宁主义的社会科学，而把资产阶级社会学作为唯一的社会科学。并要求把资产阶级社会学、政治学、法律学等等“一行一业”地加以安排，把人民内部矛盾，大大小小的问题都开出来，交给他们这些资产阶级社会学者（事实上都是些政治野心家）去研究。同时还提出，组织上述这些“行业”的各种学会，大胆使用这些“行业”的旧学者，培养他们的新生力量。正是为了达到他们这些目的，在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上费孝通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文章里，才特别提出中国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两位“大师”——陈达和李景汉，来大肆鼓吹和捧场。人所共知，费孝通这个纲领和陈达的提案内容，后来都不折不扣地收入了民盟中央的“科学纲领”。天津南开大学教授雷海宗也不示弱，在1957年4月4日中共天津市委召开的宣传会议上发言，大放厥辞，响应北京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的号召，并恣情地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4月10日，在“新建设”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吴景超、费孝通、潘光旦等人发表了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意见。就在6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以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为核心的“民盟‘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那同一天，由陈达主持，有吴景超、费孝通、李景汉等人参加的座谈会上，他们以为时机完全成熟，事情大有可为，于是便更进一步具体安排如何调兵遣将恢复大学中的社会学系了。

显然，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之所以要大肆活动，用尽一切办法来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其目的有三：第一，是利用他们所说的社会调查，在城市、乡村、工厂、企业、机关、学校中寻

找矛盾，制造矛盾，扩大矛盾，轉化矛盾，遂行他們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而到处钻空子，到处点火，以便恢复资本主义；第二，是在思想上宣傳资产阶级社会学，而在政治上夺取党在文化科学方面的领导权；第三，是在組織上团结一切他們所能团结的反共分子（也就是費孝通所說的“心里还不忘旧好，有机会再繼續搞老行”的那些对共产党、对新社会心怀不滿而“无所适从”的人們），把他們組織起来，来达到他們的上述两条目的（关于这些方面，我們在将来还必须进行深刻而細致的批判，在这里只是先带一笔）。

可是，好梦不长，在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上吹响了反右派斗争的号角以后，这些披着学者外衣的教授专家们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实质上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的罪恶企图，就大白于天下了。

应该看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虽然在政治上已经一步一步地被我們击潰了，但是，这还并不等于他們在思想上繳了械，而且还有新的花样（例如赵文壁要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学大綱”就是典型的例子）。资产阶级社会学在我們国家里也还有它一定的市場，有些人对于它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究竟是彻头彻尾反动的东西，还是有什么“合理部分”，仍然存在着疑問。因此，在思想战线上更高地举起馬克思主义的战斗旗帜，对资产阶级社会学进行彻底的批判，是我們責无旁貸的任务。

资产阶级社会学不是香花，而是毒草，这应该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今天，多少具有現代科学特别是現代社会科学知識的人們的一种普通常識了。它之所以是毒草，就是因为它在本質上是違反真理的，是反科学的，是反馬克思主义的，而

且它是以反对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其根本特征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最偉大的科学家，他們是最富有科学良心的人。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沒有忽視在他們以前——不論是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方面——有任何科学貢獻的人。这不仅表現在他們对黑格尔和費尔巴哈的評价上，而且也还表現在他們对亚当·斯密、李嘉图，以及法国在政治上极为反动的历史学家——基佐的評价上。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書中，对于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門、傅立叶、欧文等人的历史功績，又作了极为重要的評价。这就足以說明，馬克思主义学說是真正集中了人类先进思想的一切优秀成果的。而作为这个学說的創始人，确确实实不肯輕易抛弃和非薄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有某些貢獻的个人和学派。一切馬克思主义者都遵循着这个路綫，竭力找寻在思想领域中多少有些香味的花朵，把它攝采过来用之于发展和丰富自己本身。可是在这里还有一个带根本性的問題，必須加以說明。这就是对于以反对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其根本特征的資產階級社会学，却不能如此說，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階級社会科学的理論基础。它第一次揭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識的科学真理，它把社会形态发展过程看作是自然历史过程。正如列宁所說，只有馬克思的这个創造才产生了真正科学的社会学。

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类的历史看作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在階級社会里，同时又是階級斗争的历史。因此，历史的真正創造者只能是人民群众，而历史也就是人民群众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的階級斗争的理論明确指出：无产階級革命的理論

是以无产階級專政为核心的。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的階級斗争，必須通过无产階級專政来彻底消灭資产階級之为階級，而完成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些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最主要的或者說是最基本的东西。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在階級社会中的具体运用，必須严格遵守馬克思主义的階級分析的方法，来解剖社会現象，分析每个階級、每个阶层，以及分析代表每个階級、每个阶层利益的集团和个人。階級分析的方法的正确运用，是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队共产党規定战略策略，用以取得无产階級專政和巩固无产階級專政，消灭資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保証。这就是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历史上任何社会科学的彻底革命性質。而同时它也就有力地宣布了資产階級反科学的社会学的根本破产。这就是說，自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已經卓有成效地把他們的辯証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推广到社会历史領域中来，首次地在人类思想史上宣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誕生的时候，所謂什么資产階級的社会学，就不能不攻击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就不能不麻醉无产者和反对无产階級运动，就不能不誣蔑以至于企图取消馬克思主义的階級分析的方法，就一定要特別集中火力攻打无产階級專政的理論，极端仇視社会主义制度。它就不可能不为了挽救資本主义免于死亡，而創造各种各样的反对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香花乎，毒草乎，决定資产階級社会学的性質的正是客觀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轉移的历史发展的規律。一句話，自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之日起，資产階級社会学要想不成为毒草，不成为极端反动的东西，是絕對不可能的。

一般地說來，从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法国实证論者孔德所創立的資產階級社会学，以及后来的英国实证論者斯宾塞所发展了的資產階級社会学，都是以宣揚资本主义制度沒有内部矛盾，无产阶级和資產階級不是对立的階級而是可以互相協調互相諧和的階級为其共同特点的。为此，馬克思主义的經典作家馬克思和列宁，先后对孔德和斯宾塞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列宁把孔德叫做是“墮落的自命为哲学家的空談家”，并指出斯宾塞是个“伪学者”。（当然我們还必须注意到孔德的思想对他所处的时代的社会所起的作用，不仅不同于帝国主义时代資產階級社会学家們的社会作用，而且也 and 斯宾塞所起的社会作用有些区别。）至于后来那些在帝国主义时代自称为孔德和斯宾塞的后裔的資產階級社会学家，不論在英国、法国还是在美国，也不論是地理学派、生物学派、心理学派、文化学派，以至于近年来在美国流行的原子社会学派，都毫无例外地变本加厉地仇恨工人階級，仇恨馬克思主义，他們从各方面改头換面地虛构体系，为资本主义制度，为帝国主义的經濟利益和政治統治服务。

而特殊地說來，旧中国的資產階級社会学都是从西方学来的，不是从英国，就是从美国，而且后来主要是从美国。必須看到，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中国的資產階級是不可能創造自己的、独立的資產階級社会学的。斯宾塞的“群学肆言”在1903年由严复介紹到中国来，它所起的作用，比起赫胥黎的“天演論”，达尔文的进化論，显然不同。大約在40多年前，旧中国的大学里开始創立了社会学系，絕妙的是这些社会学系不是建立在別的地方，而恰恰是建立在帝国主义在中国开

設的上海聖約翰大學和北京燕京大學。這樣，帝國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社會學，就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開始傳播起來，在思想界和學術界散布着反動的毒素。等到馬克思主義隨着十月革命的炮聲傳到中國，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資產階級社會學所起的反動作用，就更加明顯起來。在美國培養出來的一些中國資產階級社會學家，在這個領域里，都扮演着極為重要的角色。就在這些年代里，他們研究了他們所說的、形形色色的社會問題，什麼都市問題、農村問題、勞工問題、婦女問題、生育問題、优生學問題等等，也亂七八糟地出版了一些著作，如什麼“社會學大綱”、“中國社會問題”、“觀察叢書”等等。這種社會學的階級本性決定了，沒有一本書和一篇文章，不是反對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理論，不是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的。即以大名鼎鼎的陳達先生所著的“中國勞工問題”為例，它的最後結論就是宣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調和的反動理論。至於潘光旦的“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則是直接抄襲美帝國主義社會學家的著作，對偉大的中華民族進行了極其惡毒的誣蔑，在他的“政學罪言”中，反對共產黨、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火藥氣，更是咄咄逼人。特別值得指出的是由這些人物，這些自命為社會學家的專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所構成的特殊的精神世界。他們中間不少人把資產階級社會學一方面和杜威胡適之流的實用主義哲學結合起來，另一方面又和中國傳統的封建思想結合起來，形成一種不東不西，非駟非馬的混合物。我們不僅從他們的著作中，看到了杜威胡適的實用主義方法論的具體運用（應該說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不論孔德和斯賓塞都是實證論者，實用主義只不過是實證

論的一个新的流派而已)，而且从乡村建設派(不論是梁漱溟还是晏阳初)的著作中，看到了資產階級社会学的直接杂交。凡是有兴趣把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設理論”、“中国文化要义”和費孝通的“乡土重建”等著作对照起来看一下的人，都可以一目了然。

而这些“著名”人物，如吳景超、費孝通、潘光旦等，由于他們在政治上从表面上看来，似乎不偏不倚，介乎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党之間，而在實質上，他們都是第三条路綫的重要人物，是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他們长期作着有利于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不利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活动。在1947年中国共产党所領導的中国革命快要胜利的时候，他們表现得更为露骨，而从最近反右派斗争中，更可以看出他們是如何劳心焦思地成天做着走第三条路綫的黄金梦。这說明了要求資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始終是这一小撮資產階級社会学家們的最高理想。这就完全可以看出，資產階級社会学以及研究这門“科学”的教授专家們，在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和政治界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了。

一般說来，資產階級社会学从来就不是香花，而特殊說来，資產階級社会学在中国又始終是毒草。这难道还不明白嗎？既然是毒草，就應該把它鋤掉。这难道还有什么可說的嗎？

解放以后，大专学校課程改革以来，在大学里取消这門課程，显然是完全正确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鏟除資產階級社会学这株毒草，就不能更好和更快地开放历史唯物主义这朵香花，这难道不是事实嗎？

可是，为什么資產階級社会学者們，在“百花齐放、百家爭

鳴”之际，又要橫一篇文章、豎一篇文章，东一个會議、西一个會議，訂綱領、作計劃，硬要恢复这門課程，硬要使这棵毒草蔓延，硬要使它发展起来呢？除开是为了卷土重来，攻击馬克思主义，攻击社会主义，企图在理論、思想战綫上，拿出臭名远揚的資产階級社会学和决定我們国家命运的历史唯物主义互相对抗，橫加抵制，从而为資本主义制度复辟开辟道路，还能够有另外的目的嗎？

因此，我們在这里必須进一步展开大辯論，进一步粉碎这些教授专家們提出来的、恢复資产階級社会学的种种理由。

据說第一个理由是：恢复資产階級社会学可以“尽量吸收其中的合理部分，来丰富历史唯物論”（吳景超語）。关于这个問題，不仅右派分子吳景超是这样說的，甚至有人批判这种說法，也不敢直接否認資产階級社会学的“合理部分”。可是，問題在于：資产階級社会学的“合理部分”到底在哪里呢？这在一切主張恢复資产階級社会学的人，都不能做出明确的答案。論立場和观点是資产階級的，論方法是实用主义的。那么，这个“合理部分”到底是什么呢？作者最近也翻了一些資产階級社会学的書，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可是，找来找去，实在找不出什么“合理部分”。

当然，应当指出，在某些著作中有些資料性的东西，有些数目字。这些东西，有时是可以批判采用的。但能够說，这就是它的“合理部分”嗎？能不能說列宁根据俄国一些資产階級学者的一些調查和統計表写出了“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一書，就是列宁吸收了那些著作中的“合理部分”了呢？我看是不能这样說的。而且还應該注意到，在这一方面，中国的資产階級



学者，比俄国的资产阶级学者还落后。正如毛主席所说：“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这的确是事实。

因此，把我們批判地利用过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的某些著作中的某些资料，说成是吸收了它的“合理部分”，是说不通的。至于说通过这种吸收来丰富历史唯物主义，那就更是奇谈怪论了。

历史唯物主义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之日起，已经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生活，它的丰富和发展是依赖于它所指导的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当然也同时依赖于它和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批判斗争。它是不能够，而且绝对不能够依赖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合理部分”来丰富和发展的。在这一点上，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多少有点象庄子秋水篇所说的，“鴟得腐鼠，鸛鷀过之，仰而视之曰，吓”的味道，那就让他们“吓”去吧！

据说第二个理由是：毛主席“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有矛盾就要处理，要处理就得考察并分析这些矛盾，这就需要知识，这就是社会科学”（指资产阶级社会学，下同），因此，“今后社会科学大有可为”（费孝通语）。关于这一点大概是无意之间暴露了资产阶级社会学教授专家们的政治野心了吧！

毛主席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确实是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重要理论保证，而且在他的讲话中，对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是非常深刻而